

私人时间与政治 中国城市闲暇模式的变化

○ 王绍光

ABSTRACT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examine the changing boundary between the public and the private in contemporary China by reviewing changing leisure patterns in the last forty years. Leisure in Mao's China was strictly controlled by the Party-state. In the course of China's economic reform, the legitimacy of private time has been rehabilitated. Along with the state's intentional retreat and societal forces' "nibbling" efforts, Chinese people now enjoy a relatively larger private sphere than at anytime since 1949.

所有社会，不论其复杂程度如何，都得区分“私”与“公”。但是，如何定义私域（private sphere），不同的社会之间是有差别的，即使在同一社会里，不同的时期，定义也不一样。本文试图通过回顾过去四十年里，当代中国闲暇方式的变化来考察“公”、“私”界限的演化。本文共五部分：第一部分在理论上对私人时间与政治的关系作一个简要的探讨。第二部分，回顾毛泽东时代的闲暇方式。第三部分叙述邓小平时代，中国在如何利用闲暇时间上的主要发展趋势。而第四部分则分析在 80 年代，闲暇实践的主要特色。第五部分讨论市场化对于国家控制闲暇产生了什么影响。

私人时间与政治

私域有两个向度：空间向度和时间向度。在讨论私域意义时，许多人都把注意力集中在私人空间上。人们所忽视了的是——私人时间象私人空间一样，是构成完整的私域的一部分。对于私域的形成和维持，两者缺一不可。就好比一杯属于自己的咖啡，如果没有时间喝，就不能给自己带来快感一样。

《韦氏第三版新国际字典》，把闲暇定义为：“由于暂时免除了工作或责任而带来的自由时间”，绝大多数社会学家也把闲暇同自由时间相提并论。为了便于说明，我们可以引用魏克曼（Vickerman）为例子。他把闲暇看作“大体上等同于自由时间。是在承担了工作责任，满足了像睡、吃、个人卫生这类重要的人类基本生存条件之后所剩余的时间。”^①我们知道即使在最民主的体制下，工作时间也仍然受到严格的约束和控制。然而很少有人对闲暇应该是私人时间这样的观点提

出异议。长久以来，人们似乎早已接受了一条普遍规则，那就是“上班的时间由老板支配，下班以后的时间由自己作主”。^⑨人们是在闲暇而不是在工作时，认为自己是自由的：爱干啥就干啥；愿意怎样发展就怎样发展。

对于人的发展，闲暇也被视为至关重要的一环。例如，亚里士多德主张：“自然本身要求我们应该不仅能很好地工作，而且也能很好地利用闲暇。”^⑩因为，一切行动的首要规则是闲暇。也许没有任何人比马克思更加重视闲暇了：

“时间是人发展的机会。如果一个人除了睡和吃以外，只是为资本家卖命，没有自由支配的时间，他只不过是一头负重的牲畜而已。”^⑪

然而，显而易见的是，闲暇应该有一定限度。首先，似乎有必要对多少时间应用于工作，多少时间应用于闲暇作出规定。历史记载表明，自工业化开始以来，这个问题便成了社会冲突的焦点之一。^⑫更重要的是，自由时间可能被滥用。滥用闲暇的方式举不胜举。例如犯罪、暴力及生理上、心理上的堕落一般都是在人们的闲暇时间中进行的。对于不加限制的闲暇所可能带来的后果，政治与文化精英一直表示关注。经常有人督促百姓们“适当地”、“正确地”、“有效地”、“明智地”、“建设性地”，总之要“合理地”利用闲暇。问题在于谁有权决定什么样的闲暇活动是可以接受的，而什么又是不能接受的。在传统社会里，“文化”圣贤们负有重任来找出正确使用闲暇方式的标准。^⑬然而，在现代社会，对于闲暇活动的规定，越来越多地涉及到使用国家权力。现代国家不论是资本主义也罢，社会主义也罢，都试图培养或强加某类“可接受的闲暇活动”观念，其目标都是为了促使各种社会集团“合理地娱乐”，以控制自由时间中潜在的危险。^⑭

因此，自由时间中的“自由”仅仅意味着时间在个人的支配之下，且不需承担工作责任。像任何其他事情一样，自由时间的“自由”实际上却或多或少要受到限制。在古罗马帝国时代，“面包和马戏”已被当作社会控制的行之有效的方法了。考虑到闲暇在今天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国家力图对闲暇活动作某些制约也许是不可避免的，为了维持社会稳定和自身统治，国家需要塑造一个“有纪律约束的”、“健康的”（生理方面和心理方面）民族群体。为此，它不得不一方面压制“非道德的”、“不合理的”及“危险的”活动，而另一方面，又灌输它认为高尚的社会和道德行为方式。

闲暇政治不但存在于国家一方所作的种种控制努力，而且也存在于被统治者一方为了摆脱强加的限制而作的种种反控制行为之中。把被统治者描绘成只是一群被动的闲暇消费者，对闲暇的内容和形式毫无选择权，明显是错误的。事实上，被统治者有能力抵抗种种社会控制的尝试，并与之竞争。正如卡里斯·罗杰克（Chris Rojek）指出的那样：

“传统闲暇社会学的认识中的一个主要错误是这样一种观点，认为社会化只是简单地把有关闲暇行为的价值观和信念灌输给社会中的每个人。与此相反，需要强调的是在闲暇实践中，成年的人们一般都具备足够的技巧和丰富的知识来扮演各种社会角色，因此，他们在闲暇生活中，有能力摆脱各种控制，别开生面。”^⑮

换句话说，国家的霸权决不是无懈可击的；被统治者往往能渗透、中和和颠覆这个霸权。^⑯

因此，闲暇最好被看做是一个国家与社会的较力场。^⑰它不断地重新界定国家和社会之间的现存关系。^⑱这就是闲暇的真正含义。这是为什么我选择了闲暇作为一个突破口，来考察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变化关系。许多人会认为闲暇之事微不足道，不值得认真对待。确实，为了闲暇本身而研究闲暇（像社会其他方面一样），没有多大意义。但是，如果我们透过闲暇的表面，努力渗透到那导致了现存闲暇关系的深层结构，闲暇的研究则有助于我们揭示其他研究可能揭示不了的某些政治层面。

因此，本文关心的重点不是闲暇本身。本文的真正目的是探讨闲暇研究如何能加深我们对当代中国社会性质的理解。为此，我们必须首先回答下列问题：中国人享有多少喘息时间和空间？中国政府如何定义“健康的”和“不健康的”闲暇？政府通过什么机制保证它关于正当和不正当的娱乐的定义为人们广泛接受？过去四十年来，闲暇方式发生了哪些变化？在多大程度上官方的闲暇观能够影响人们日常的闲暇实践？通过集中探讨在整个社会、经济、政治关系中，闲暇结构性位置的变化，我们希望揭示中国社会中国家权力的盛衰。

毛泽东时代中国闲暇

一般而言，控制闲暇可采用下面三种办法之一，或者它们的某种结合。一、规定闲暇的时间长短；二、规定闲暇的形式；三、规定闲暇的内容。中国共产党政权在文化大革命（下简称文革）结束前的二十几年中，所有三种办法都采用过。

规定闲暇时间长短：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闲暇代表了摆脱“单调的经济关系压力”的一个安息所。马克思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里，闲暇时间的数量将成为衡量财富的一个重要手段。人们能够把这些时间用在“他们人格的和谐发展”上^⑩。但根据毛泽东时代对马克思的解释，闲暇仅仅是给工人喘息时间，使他们得以复原。只有当工人用这些时间来休息，减轻压力，并且增加体力和智力时，闲暇才有意义。这样，他们才会在闲暇之后，更有效地工作。这就是为什么在毛泽东时代，很流行列宁的一句语录：“不会休息的人就不会工作。”这里，重点是在讲工作。1959年，官方一位评论员写道：

“人为什么天天要吃饭、喝水、穿衣服、住房子，有时候还要听音乐看戏、看电影、看各种各样艺术作品呢？即人为什么要活着呢？……人生产是为了生活，生活归根到底又是为了生产。”^⑪

既然人们认为闲暇应该从属于工作，那么，为了增加产量，就可以牺牲闲暇。从50年代至70年代，中国的计划者和管理者倾向于认为，只要能保证使工人能得到足够的时间恢复身体，削减闲暇没什么不对的。在那些年里，不给或很少给补偿，就要求工人加班加点的现象并不罕见。而且还经常在星期天和假日里，组织党、团员及政治积极分子从事“义务劳动”。^⑫在大跃进期间，这样的活动达到高潮，那时，亿万中国人被催得太紧。他们甚至在缺乏足够睡眠的情况下，连续工作几个月。弗雷德里克·劳斯尔（Frederick Noisal）是加拿大《环球新闻报》当时驻北京的记者，在其1959年发自北京的报导中，他说看见在许多场合“筋疲力尽的工人、妇女和农民”。他注意到“在刺耳的扩音器下面，人们也能安静地沉睡着，即使在北京歌剧院表演期间，中国乐器伴奏似乎足以使最累的人也被吵醒时，还有不少进入了梦乡。”他根据所见所闻作出了这样的结论：“在中国，西方人所理解的完全的闲暇是非常少见的。今天的中国，没有尽头的生活周期只包括工作、学习、吃饭、睡觉。”^⑬

在一段时间内，人们可以忍受疲倦。但是无论他们是如何忠诚于政权，要他们永远忍受下去则是办不到的。中国领导人很快意识到，让人们承受太大生理和精神压力可能不利于生产。1958年11月至1960年5月期间，党中央至少发出了两个指示，要求应保证人民群众“有八小时睡眠时间”，并且有另外几个小时的“自由时间”。^⑭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里，“闲暇”仍然被看作被动的消遣和工作精力的恢复。^⑮政府并无意放弃对时间的控制。这两个文件实际上都规定“群众的时间”应服从于“统一计划”。^⑯

规定闲暇的形式：

在中国的政治文化里，公共利益一直占据了“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优先位置”。而共产党的革命则加强了这个公共利益概念，^⑰像所有其他事物一样，在文革之前和文革中，闲暇的形式反映了

这个特征。在“集体主义”的名义下，闲暇活动应采取集体行动的形式，这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例如。1954年，河南省开封市第一中学制定了一套规则，标题是——“这些时间做什么？怎么做？”规则有十六项五十六条。这些条文对起床、洗脸、吃饭、上课、上操、课间休息、睡觉都做了十分细致而具体的规定，如吃饭时怎样分菜，怎样吃饭，碗怎么放，上操，上体育课时和晚集合时怎样走路等等。总之，所有的事情都应组织起来一块儿干。^②在那个时候，这个例子并非个别。不顾学生和工人的个人爱好而把他们组织起来去影剧院看电影、组织体育比赛、举办舞会，是非常普遍的。有些学校还在学生看电影、看球、跳舞时，把校门、课堂门和厕所都上了锁，认为这种做法是教育学生集体主义精神的好办法。甚至读书也有规定。党支部、团支部不时地列出“推荐书籍”的单子来。然后，就制订出讨论的时间。这样，人们就觉得不得不去读这些规定的书。那些没有参加官方组织的闲暇活动的人则要冒着被批评成“脱离群众”和“缺乏集体主义精神”的危险。^③

既然人们这样高度评价“集体主义”，因此，政府在工厂、军队和学校里大力提倡象篮球、足球和排球这类集体项目也就不奇怪了。集体项目被当作一种工具，目的是培养人们的集体意识、合作意识、自我牺牲精神，这些价值与官方的集体主义意识形态完全一致。

规定闲暇内容：

如果说在50年代，国家已经占用了人们的大量时间，而且开始规定人们闲暇活动的方式，在60、70年代，则进而试图规定闲暇活动的内容

1960年3月，当时全国发行量最大的杂志——《中国青年》刊登了一封信，作者是署名为肖文的年轻妇女。在信中，她表达了希望能有更多的自由、愉快的闲暇时间的愿望。^④在接下来的三个月中，杂志收到了14000多封讨论此信的来稿，并且有选择地公开了大约十二份。公布的大部分信件对于肖的愿望采取了一种严厉的批评态度。其中典型的观点是：中国人民还未达到享受的时候，因为共产主义在中国还未实现。批评者坚持认为，那些过多注意闲暇的人不可能成为“真正的革命者。”^⑤这场讨论得出的结论是：业余时间不应用于个人享受。相反，它应用来提高一个人的“政治觉悟”。

60年代初，开始发展了一套新的闲暇观。据说业余时间不可能是政治真空。它要么被无产阶级思想占领，要么就被资产阶级思想占领。由于创造了这套意识形态，闲暇变得越来越政治化了。到文革结束时，闲暇的政治化过程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大体上从1960—1962年）政治化相对较温和。人们被告诫，用一种漫不经心的态度来享受娱乐在政治上是危险的。虽然经过社会化改造的人们可能已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国家还是认为让他们在闲暇时继续巩固他们早先在工作中学习到的东西，是必要的。人们还被提醒，对于电影、戏剧、音乐、小说、绘画及其他类似的作品潜台词要保持警惕。特别是那些外国进口的和解放前发行的作品。他们被告知，体育也不像通常所认为的那样纯洁，因为“锦标主义”仍在中国有很大影响，它被称之为一种“极大的个人主义”并受到批判。比赛被认为应用来增强“集体主义”。换句话说，没有纯粹的闲暇。闲暇被认为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争夺的阵地。^⑥

在第一阶段，人们只是被提示要求自己去判断对与错。在第二阶段（1963—1965年），人们则开始被给予明确的指示。

1963年，《千万不要忘记》和《年轻的一代》两部现代话剧被搬上了舞台。每部戏中都有一个反面人物。前者是丁少纯，后者是林育生。丁少纯由于忘记了自己的工人阶级出身而受到批判，他之所以被认为“忘本”，部分原因是他已养成了一个资产阶级生活习惯——打猎。林育生受批判则是因为他幻想娶一个漂亮的姑娘作妻子，有个安乐的小家庭，“白天我们一起去上班，晚上回来就

听听音乐，看看小说，读读诗，看看电影，星期天上公园，或者找几个朋友聊聊天……”他被指责为试图“躲进个人主义安乐窝里去，追求个人享受”。据批判者说“在无产阶级革命者看来，革命同追求个人享受是水火不相容的。要革命，就不能追求个人享受；要追求个人享受，就不能革命。”当时每一个主要大城市都上演了这两部话剧，并将它们拍成电影，组织工人和学生观看。全国性和地方性的报刊杂志也辟出专栏对它们进行讨论。通过提供这两个反面例子，党希望教育人民，最重要的是，在他们闲暇时，他们应该干些什么不应干些什么。^②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以在一组文章的标题里找到。这组文章发表在1964年《中国青年》第八/九期上。标题有“要珍惜业余时间”，“业余生活要服务于工作”，“下班后也要严格要求自己”，“业余生活要以学习为主”。^③

也是在60年代中期，官方的出版物开始警告人们：“玩物丧志”。结果，打猎、钓鱼、养鸟、种花及所有其他各种爱好者面临了一个艰难的选择：或者放弃爱好，或者受到“沉溺于小资产阶级的情趣”的批判。

第三阶段，文革中（1966—1976年），国家对人们日常生活的侵犯达到这样一个程度：“私人时间”和“公共时间”的划分已成为毫无意义了。文革开始后的“破四旧运动”中出现了这样一条不成文法规：除非得到官方许可，否则没有闲暇活动是合法的。这样有数年，八亿人民只允许观看八部“革命样板戏”和几十部精心挑选的“革命”影片。在文革的后期，拍的影片多了，出版的书也多了，但在很大程度上，它们只是以一种粗糙的艺术形式简单地进行宣传，甚至没有作出给人们以消遣的样子。因为“闲暇”这个词本身已变成了一个坏字眼。

正如苏珊·福特·维尔特夏尔（Susan Ford Wiltshire）所巧妙地评论的那样：“当私人生活的乱石渣被完全消除干净后，公共生活被变成了一堵表面光洁无比的巨墙。巨墙里面什么都只是一个模样”^④。

当然，共产党维持对闲暇的控制的努力程度是一码事，而这种控制有多大可能实现又是另一码事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67、1968两年文革进行到高潮时，许多中国人发觉，多少年来他们第一次有了大量的自由时间。那些由于某种原因而在派性斗争中没有利益关系的人，被称为“逍遥派”。既然学校关闭了，工厂受到严重破坏，“逍遥派”的问题在于如何消磨时间。年纪小一点的学生觉得同他们的邻居在一块玩儿要比与那些红卫兵组织的同志在一起快活多了。每天，他们在大街上游逛，从一些儿童的游戏中，如“斗鸡”、“放信鸽”中寻找刺激。年纪大一些的高中生和大学生则有更高级的娱乐方法：一些人打牌、下象棋、下围棋，另一些则读古今中外的小说，那些在“破四旧”运动中遭到烧毁的书籍现在则成了抢手货。还有一些年轻人在大街上泡女孩，他们沉浸于浪漫生活之中，把周围动荡不安的世界从他们的思想中部分地抹去。也有一些人忙忙碌碌：有的回到象牙塔中，一心一意地学外语，研究数学、物理等等；有的则较实际，学编织、裁剪、烹调、装修收音机、练习乐器及发展其他技能。这样，钓鱼、打猎、做木工和家庭装修成了许多人的爱好。1967年后半期，在中国的许多城市，谣传经常在静脉里注射公鸡血，可以延年益寿。很快这就成了城镇中的热门话题。许多人大胆地亲自试验这个配方。更多的人乐于谈论它是如何灵验。当成百上千的人在派性斗争中被打死打伤的同时，另一些人却在寻找延长寿命的秘方。这时，许多原来贴上“毒草”标签的电影又在放映了。其名义是为了批判“毒草”，群众需要看或是重看。但实际是，许多人对只看几部单调的“革命”片已经厌倦了，他们需要更多的选择。一些群众组织甚至想从给文化上饥饿的观众放电影中谋取利益。那时不断有报道说，这类电影的拷贝被从一个组织手中抢到另一个组织手中。^⑤

邓时代的闲暇

文革结束后，中国在80年代市场取向的改革和开放政策下，人们的闲暇方式。

政府对闲暇态度的变化：

80年代不同于以前的30多年。首先在于官方态度的变化。从50至70年代，中国政府所努力争取的是：除了那些与国家的意识形态一致的闲暇活动外，其他的闲暇都要受到限制。但在80年代，政府“允许人们用他们乐意的方式来打发时间，只要他们的活动不对现存社会秩序构成威胁。”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放弃了对闲暇的控制。实际上，对现存的社会秩序构成威胁的行为仍必须受到严格限制。然而，闲暇不再总是必须去适合国家意识形态的公式化框架了。文革之后，国家之所以愿意部分地解除它对闲暇的控制，是因为党已经降低了对“集体主义”的评价。不再以“阶级斗争”为纲。因此承认消遣、娱乐和相对自由的选择作为闲暇的正当因素，也就很有必要了。

这样，“公共”和“私人”之间时间分界又出现了，虽然这个界线还远谈不上清晰。作为新的“社会契约”的一部分，国家为管理闲暇活动制定了一个新的指导方针：“提倡有益的，允许无害的，反对有害的。”^②

闲暇时间的增加：

中国的时间一分配调查一般把人们的日常行为分为四种类型：工作（包括上下班时间）、生理需要、家务和自由时间。生理需要（睡、吃和个人卫生）所需的时间明显地最不具有弹性。这样，增加闲暇时间就必须依靠减少工作和家务时间来达到。1949年以来，中国官方规定的工作量一直是一天8小时，一周共48小时。这种情况到80年代后期仍未改变^③。但是如前所叙，如果把各种非正式的工作形式，如无报酬、超量的“义务”劳动，参加各类政治活动也包括在内，则在过去三十年里，实际工作时间要长得多，文革后，由于义务劳动和政治学习已逐渐丧失了往日的吸引力，实际工作时间已大大减少。但由于在80年代之前，没有作过时间分配方面的调查，因此要证明具体减少了多少时间是不可能的。

家务负担一直都很沉重，占据了中国人的一大部分非工作时间。但由于各种节时电器（电冰箱、洗衣机、煤气灶、缝纫机等）的日益普及，商品供给的改善，服务业的兴起，更重要的是普通中国家庭购买力的提高，80年代，家务上所花的时间大大减少。^④

表一 闲暇时间的变化

Table 1: Leisure Time

(in hours and minutes)

单位：小时：分

年 (Year)	1980 (a)	1982 (b)	1984 (c)	1986 (d)	1988 (e)
----------	----------	----------	----------	----------	----------

- a. 王雅林、李念荣，“城市职工家务劳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1期，页60。
- b. 国家统计局，《中国社会统计资料，1985》，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5年，页307。
- c. 国家统计局，《中国社会统计资料，1987》，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7年，页281—282。
- d. 青连斌：“大城市职工生活时间分配和利用问题的初步研究”，《社会学研究》，1990年第1期，页92—102。
- e. 卢汉龙：“来自个体的社会报告”，《社会学研究》，1990年第1期，页83。
- f. 国家统计局，《中国社会发展资料，1992》，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2年，页114。

由于减少了实际工作和家务时间，结果自由时间的总量增加了。^⑤

闲暇方式的变化：

在取消闲暇垄断的同时，中国出现了录音机和电视。60年代，中国每年平均生产黑白电视机3000台。70年代，平均每年生产彩电3000台，其中的大部分是属于工作单位而不是个人家庭所有。^⑥然而，到了80年代末，90%以上的城市家庭至少拥有一台电视机。^⑦80年代之前，大多数中国

人从未见过录音机，现在的中国城市里，录音机则是一件日常生活用品。^⑤最近几年，录相机、音响设备和卡拉OK也开始进入了中国家庭。

这些现代化的娱乐设备给中国人的消磨闲暇时间的方式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80年代之前，主要的自由时间活动形式无外是，听收音机、看电影、结交朋友（聊天），还有就是什么也不做，闲着。1985年，电视机观众首次超过了收音机听众。^⑨一份1987年的全国调查表明，平均每个城市居民每天在电视机前花1.5—2小时。这个数字占去了其可能拥有的闲暇的几乎一半。^⑩最近，更多的调查表明，自1982年以来，看电视已成为最普遍的闲暇活动形式。^⑪

在电视兴起的同时，看电影则大大减少了。一个典型的中国城市居民，看电影从1979年的每两星期一次减少到1985年的每四星期一次。^⑨在这之后，电影观众趋于稳定。1990年，43亿人次城市居民看过电影，虽然这个数字意味着比1979年的观众纪录减少了5亿人，但表明看电影仍然是一种重要的闲暇形式。^⑩

是一种重要的休闲形式。具有同样重要意义的是，过去几年里兴起了录相。录相成为看电影和电视之外的又一种选择。最近有人估计，中国已经有 60—70 万台录相机。而且这个数字还在迅速增加。在上海、北京这类大城市，每五户中至少有一户拥有录相机。在广州，这个比率达到了 40%。^①80 年代中后期国营单位（如工人文化馆）和私人经营者一样，发现开“录相厅”有利可图。这样，全国的录相厅如雨后春笋般大量出现。^②相对而言政府对电影和电视的内容通常进行较严格的控制。然而，要监视主要是由利益驱使的录相厅里放映什么，则是很困难的。事实上，在最初几年里，国家几乎没有自己的录相片可供放映。1984 年以后，港台及外国进口片子已控制了整个录相厅。据估计，在 1985 年，大约有 2000 种非法录相片在这个国家里流通^③。中国制作的影片和电视剧较沉闷。相比之下，外国影片较多感官刺激，这就吸引了大量观众。许多人特别是年轻人，不愿去看电影或呆在家中看电视，却成了录相厅的常客。^④例如，在上海这个 1000 万人口的城市里，从 1987 年 11 月至 1988 年 4 月的六个月内，录相厅的观众次数达 1000 万。^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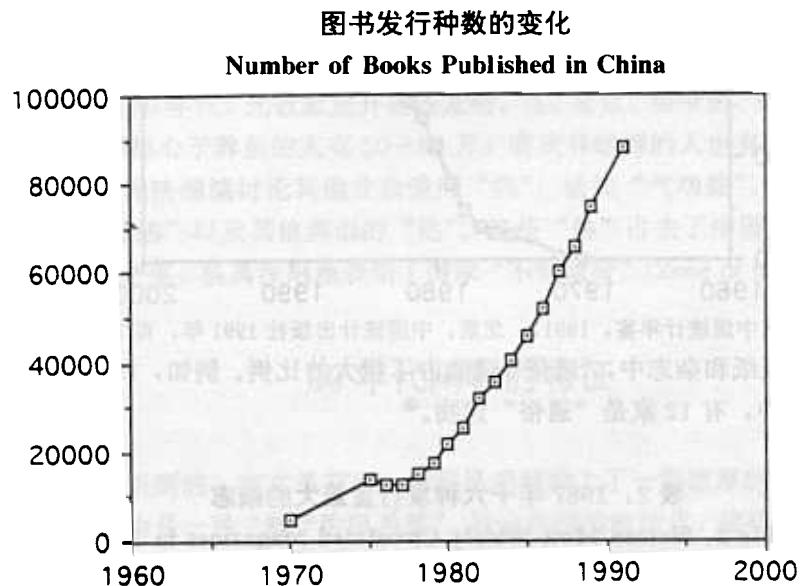
除了电视、电影、录相外，其他的流行的闲暇活动包括了听收音机、录音机及搓麻将、打台球、玩电子游戏。后三种活动值得多说几句。因为近年来，中国城市中已出现了“麻将热”、“台球热”和电子游戏机热。

球热”和电子游戏机热。1949年以后，中国政府一直反对麻将活动，因为打麻将被看成是一种赌博形式。文革开始后，“麻将”成了“破四旧”运动的靶子。结果，有十多年，麻将在中国完全消失。麻将活动的重新出现，始于80年代初的广东。而最近四、五年来，麻将热已席卷了全国。不仅退休工人、家庭妇女、个体户和工人打麻将，政府官员、大学教授、大学生甚至高中生也沉溺于这种游戏活动。在广州，有报道说，几乎每一家都有成员打麻将^⑩。在麻将热的促使下，赌博呈现出了强劲的卷土重来之势。因为只有赌，打麻将才有刺激。对于许多人来说，赌提供了一种新的娱乐方式，并且有可能赚点小钱^⑪。尽管在大多数场合，赌注很有限：只不过是几分钱或一根烟。但也有人担心赌博可能会毁掉一些人的家庭与事业。^⑫

如果说打麻将，老幼皆爱，人人都好，打台球则主要受到青年职工的喜爱；玩电子游戏机则是青少年学生的爱好。在全国大大小小的城市里，已安装了成千上万的台球桌和游戏机。许多中国人至今仍住在居室拥挤、通风条件差、光线暗淡的公寓里，对那些觉得家庭条件受到限制的年轻人来说，街头巷尾成了打发业余时间的最好去处。因此，放置了台球桌和电子游戏机的街头通常是这些工人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弟们所喜欢游逛的地方。打台球和电子游戏机不仅给人带来刺激，而且又为年轻人造就了一种非正式的集体生活。他们发觉周围的世界正变得越来越疏远了。^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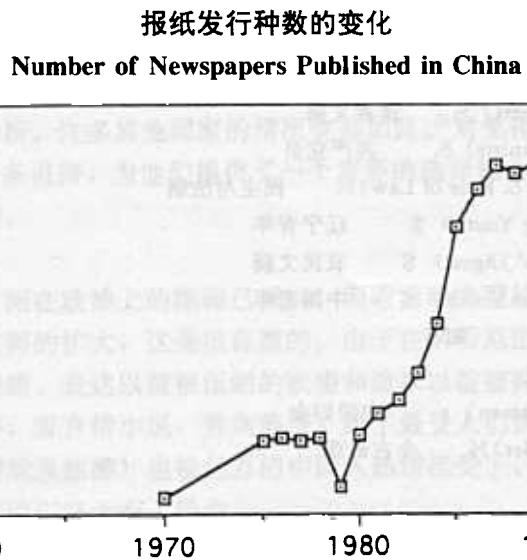
读书向来是一种重要的闲暇形式。^⑨现在，中国读者比十年前有了更多的选择机会。书籍的发行量从 1970 年的不到 5000 种增加到 1979 年的 17000 种，1991 年又增加到 88000 种（见图 1）^⑩。报纸发行的增加更令人称道，在 1970 年至 1989 年间，报纸的数量从 42 种（全国及地方的党报）增加到 852 种（见图 2）。同样的变化在发生在杂志方面——总数从 1970 年的 21 种增加到 1991 年的 6500 种。（见图 3）^⑪

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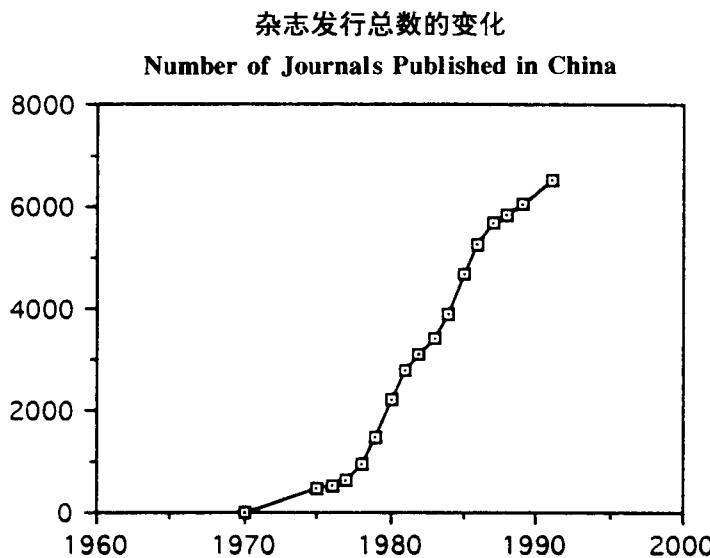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1》，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1 年，页 755。

图 2：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1》，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1 年，页 756。

图 3：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1》，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1 年，页 755。

在增加的书籍、报纸和杂志中，“通俗”读物占了很大的比例。例如，1987 年，十六家发行量超过 100 万份的杂志中，有 12 家是“通俗”读物。^④

表 2：1987 年十六种发行量最大的杂志
Table 2: Sixteen Most Widely Circulated Magazines in 1987

	(in ten thousand)	单位：万
1. Gushihui (Story-telling Session) # 故事会	494.6	
2. Banyuetan (fortnightly) & 半月谈	457.0	
3. Honqi (Red Flag) & 红旗	282.0	
4. Jiating (Family) * 家庭	255.2	
5. Qingnian yidai (Young Generation) \$ 青年一代	235.3	
6. Gushi dawang (Story King) # 故事大王	173.7	
7. Duzhe wenzhai (Readers' Digest) % 读者文摘	163.6	
8. Gongchan dangyuan (Communists) & 共产党员	160.8	
9. Minzhu yu fazhi (Democracy & Rule of Law) % 民主与法制	159.2	
10. Liaoning qingnian (Liaoning Youth) \$ 辽宁青年	150.0	
11. Nongmin wenzhai (Peasants' Digest) \$ 农民文摘	133.4	
12. Zhongguo Qingnian (Chinese Youth) \$ 中国青年	125.5	
13. Zhi yin (Boson Friends) \$ 知音	116.5	
14. Shanghai jing # 山海经	109.6	
15. Zhongguo funu (Chinese Women) * 中国妇女	107.0	
16. Jinggu qiguan (Eternal Wonder) % 今古奇观	100.0	

故事杂志，* 女性杂志，\$ 青年杂志，% 杂类，& 宣传类型

资料来源：《中国出版年鉴，1988》，页 120—121。

这些数字是否意味着中国人的闲暇更多地正朝着消遣性而非创新性的方向发展呢？不一定。业余爱好的追求也在增加。举钓鱼为例：1983年5月，在第一届中日钓鱼比赛开幕式上，高级领导人王震赞扬了钓鱼这项活动，说这是一项“健康”的活动。三个月后，在北京成立了中国钓鱼协会。并且一家专门性的杂志《中国钓鱼》也在北京创刊。截止1988年底，30个省、市、自治区中，24个已成立了钓鱼协会。会员总数超过3000万。在其他杂志的销售量下降时，《中国钓鱼》的发行量一直在递增。1987年创下了11万份的历史最高纪录。^⑨

80年代，越来越多的人们把业余时间花在追求时尚和爱好上。越来越多的人们为业余收藏所吸引。仅上海一地，就大约有10万热心的业余收藏者。从邮票到地图，从轮船模型到饮料罐，从算盘到乌龟，所有东西都有人收藏。这个城市已成立了30多个专门的收藏者协会。会员从几十到二千多不等。^⑩也是在80年代，无数家庭开始养宠物。鸟、金鱼、热带鱼、蟋蟀都有专门的爱好者。据报道，1990年上海热心于养鱼的人有50—60万，喜欢养蟋蟀的人也有50万之众。^⑪

限于篇幅，笔者无法继续讨论其他业余爱好“热”：诸如“气功热”、“旅游热”、“健身热”、“围棋热”、“服装设计热”以及其他类似的“热”。这些“热”占去了中国人的非工作时间。^⑫闲暇活动能量之大，类型之多，极其深刻地表明了国家“不管地带”（Zone of indifference）已经达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80年代闲暇的特征

非政治化：

如第二部分中所谈到的，在文革期间，闲暇活动被蒙上了一层浓厚的政治色彩。有时连闲暇这个概念本身也被认为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社会生活的政治化，使得文革后期，很多人对任何带有政治性的事物都不感兴趣。80年代，社会生活的政治色彩逐渐减少，并重新界定了私人时间和公共时间的界线，个人有了较多的自主权，能够自己决定如何使用私人时间。当然，国家并未放弃控制闲暇。

个人化：

减弱社会生活政治色彩的后果之一是造成追求闲暇的个人化。70年代后期，在十年令人厌倦的“阶级斗争”之后，人们开始从外界的社会关系中退回到家庭圈子里。电视、音响及录相设备的出现及传播又加强了这种趋势。绝大部分城市居民已习惯于工作后呆在家里。这样，在中国，家庭成了体验闲暇的主要场所。许多其他国家的情况也是如此。^⑬对觉得公共生活既无意义又疏远了的人来说，个人化作为一条退路，为他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选择机会。在这个意义上，“退路”起了一种社会安全阀的功能。

多样化：

由于享受私人生活时间在政治上的障碍已减少，闲暇活动类型越来越趋于多样化。确实，释放私人时间导致了私人空间的扩大，这是很自然的。由于在闲暇范围里有了相当的自由，人们更希望发泄以前被压抑的情绪，表达以前被压制的欲望和追求以前被抑制的兴趣。因此，许多以前被禁止的活动（如打麻将，看言情小说，养鸟等等）成了最受人们欢迎的活动。许多新的闲暇形式（如看电影，玩电子游戏及旅游）也被亿万的中国人热情接受了。这些人多年来一直都在渴望娱乐、乐趣和开心，现在他们终于有了机会。

“西化”：

这个词意指来自外部世界，包括香港和台湾的影响。在私人时间的政治色彩淡化的同时，“对外开放”政策开始实行。80年代海外游客的数量（加上来自港台的）增加了500%。^⑭为了接待海

外客人，中国在全国各地的城市里建造了星罗棋布的豪华宾馆。为了使客人过得愉快，这些宾馆都附有酒吧、迪斯科舞厅、保龄球场，在有些地方甚至有高尔夫球场，^⑩游客来了又走，但川流不息的海外游客提供了活生生的例子——在世界的其他角落，人们是怎么使用闲暇时间的。这样，KTV、酒吧和舞厅在中国城市里迅速推广开来。

中国人不一定非要去“西化”的酒吧和舞厅，才能体验到国外的影响。这种影响无处不在。现在，许多中国人爱听麦克尔·杰克逊（Michael Jackson）、邓丽君（台湾歌星）、张学友（香港歌星）的歌曲，读金庸（香港作家）、琼瑶（台湾作家）的书，或者从美国原版翻译过来的通俗作品，看港台或好莱坞拍的电影、录像及电视节目。^⑪正如奥维尔·萧尔（Orville Schell）在他的《迪斯科与民主》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中国青年把他们醒着时的每一小时都用来参加政治学习会议，读‘小红本’，为了学习工农兵而参加义务劳动，这样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通过书本、杂志、电视和电影，这些青年人对外面的世界有了一些浮光掠影的印象后，他们现在要求更刺激、更洋化的娱乐形式。”^⑫

在这段话中，如果我们用“中国人”一词来代替“中国的青年人”和“那些青年人”也完全适用。因为，不仅对于中国青年人，而且对于全体中国人来说，“门户开放”政策引进了一种新的文化模式和追求。

商业化：

闲暇地位的变化也表现在商业对闲暇领域的渗透上。现在，国家不再把闲暇仅仅看成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种不同意识形态争夺的战场了，而是也把它当作一个市场——“文化市场”。人们承认，象电影、录音带、录像片、书籍、报纸、杂志、舞厅等这类的“文化商品”应服从于适用于其他商品的同样的经济规律。这样，对于“文化商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来说，与其他商品一样，“成本”、“利润”、“数量”、“质量”、“需求”、“供给”、“竞争”和“出口”也是必不可少的考虑了。

尽管政府仍强调在“文化生产”中，“经济和社会效益”都重要。经济改革实际上已驱使多数（如果不是所有）“文化商品”的生产者牺牲“社会效益”来追求利润。

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使中国电视台和录相厅宁可从国外进口节目，而不愿自己制作。部分原因在于，从国外购买一部二十集的电视连续剧的转播权通常要花费6万元。但如果电视台决定自己制作，则花费可能高达20万元。^⑬录相制作者同样也做类似的成本——收益考虑。^⑭结果是，在中国电视上充斥着外国制作的节目，录相市场则在很大程度上被进口带子完全垄断了。

总之，从闲暇娱乐活动里可以赚到大把大把的钞票。由于这个事实，娱乐和闲暇趋于越来越商业化了。与以意识形态为动机的宣传家们不一样，大多数娱乐提供者已成为受利润驱使的商人。

两极化：

闲暇的商业化暗示着一个购买力的问题。因为一个没钱的人不可能参加商业化的闲暇活动。无数研究表明，自80年代早期以来，贫富悬殊一直在扩大^⑮。结果是，闲暇形式也在两极分化。一方面，那些收入仅够维持最低生活水平者，并未从商业化闲暇的普遍扩展中获取多少利益。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不得不从事第二职业。这样，为了获得更多的收入而付出他们的闲暇时间。^⑯

大多数中国人发现，他们的收入来源只能满足基本日常生活需要和简单的娱乐，对于他们，闲暇和娱乐的主要场所是家庭，看电视则是主要的闲暇活动。他们只是偶尔才参加那些不但花时间，而且需要花钱的闲暇活动。

另一方面，有一小部分城市人口能够有财力参与昂贵的闲暇活动。他们是那些西式舞厅，酒吧和咖啡馆的固定顾客。这个新的富裕阶层包括暴发的个体户，外国企业的雇员，文化精英和腐

败官员。对于这些人来说，特别是对个体户来说，奢侈的闲暇方式既是为了消遣和娱乐，也是为了炫耀他们的高贵地位。光顾一次舞厅、KTV、酒吧或咖啡厅的夜生活，最低的开支是上百元或更多。这对于普通的中国人来说，实在太贵，无法享受。^⑩因此，人们越来越感觉到，闲暇也透着一种深深的不平等。

自愿结社的形成

在人民共和国的最初三十年，没有任何自发组织的存在。文革以后，这种情形得以改观。在 80 年代，“出现了公开宣布自治的正式协会”。^⑪经过登记的自发、半自发及带有官方性质的协会，到 1991 年止，全国共有 10 万多个。^⑫前面所提到的全国和各地的钓鱼协会只是其中一例。但全国性和全省性自发组织仍然很少。许多新近建立的闲暇组织只是在基层单位内活动，并且限于当地。例如在首钢，1986 年有 30 多个业余爱好者俱乐部，追求广泛的兴趣：如音乐、舞蹈、现代戏剧、民间艺术、美术、书法、摄影、集邮、体育等等^⑬。这样的社团闲暇组织经常由官方的工会或团委在一个特定的单位或地区内发起，从理论上讲，他们应该服从于发起者的监督。然而，这些组织享有一定的程度的自治，在多数场合，只要他们的活动未违背发起人的利益，他们是自由的。^⑭

为了防止自发组织的闲暇活动摆脱控制，政府不提倡组成一些跨单位和跨地区的自娱组织^⑮，然而，这种组织已出现了几千个。上面提到，到 1990 年为止，仅上海的业余收藏者就建立了三十多个自发协会，又如，温州这个中等城市，1987 年有大约 400 个跨单位的闲暇组织：诸如诗歌协会、艺术沙龙、体育俱乐部、花卉爱好者协会及其他类似的协会组织。^⑯

与个人家庭生活相比，对于闲暇组织的成员来说，更重视的是在社团内自发的集体生活，几乎是为了这个缘故，政府对这样的组织持一种矛盾的态度。一方面，以家庭为中心的闲暇活动，虽然无害，但不像那些由自发社团组织的活动那样“健康”。因为前者的主要功能不在于以一种建设性的方式利用业余时间，而主要在于消磨时间。然而另一方面，任何自发组织，特别是那些超出一厂一地界限的组织，即使一开始时没有政治目的，也可能成为潜在的危险。毕竟，组织不象单独的个人或家庭那样，易于服从政府的控制。

个人偏好、市场和国家控制

在国家开始放松对私人时间的控制时，它的目的不是放弃而只是放松控制。但是，实际情况是，在过去十年，政府支配娱乐活动的能力已受到严重的削弱。这是政府当初所未曾预料到的。政府最初允许只要“无害”、什么都可以。但是，一旦个人的闲暇偏好允许通过“文化市场”来表达，它就变成了一股非常强大的力量。这股力量是如此强劲有力以致于能够“一点一点地侵蚀掉”国家对人们私人时间的控制。国家不再是娱乐产品的唯一提供者。即使是在那些似乎仍然由国家充当唯一提供者的领域里，它的控制也变得越来越缺乏效力了。主要是因为改革已把许多国家代理人从受意识形态支配的宣传者改造成了利润驱使的企业家。让我们分别举电影、电视和出版为例来说明。

电影：

国家可以有权力来决定什么是人们不应看的，但是人们有权决定什么是他们想看的。除非国家能使人们看它所希望人们看的，否则不能说国家的控制是有效的。这个任务从来都不简单。但是，当人们有了更多的选择闲暇的机会时，这就成了一个巨大的挑战。

在 80 年代早期，当四十年来，第一次允许进口西方及港台电影时，国产片大幅度地丢掉了市场。1982 年上海做了一个调查表明，62% 的观众喜欢进口片。而喜欢国产片的只是 32%，1983 年

的调查结果同样令人震惊，以中国所称的票房率作判断，只有 27% 的国产片表现得还不错（观众率达到 50% 或更高）^⑩。同样的调查表明，武打冒险片、间谍警匪片和轻松生活片高居观众选择的首位。而政府颁奖的影片则观众寥寥无几。^⑪超过 50% 的国产影片亏损，这个事实迫使中国的制片者必须认真对待观众的胃口，后来几年做了更多的调查，几乎所有这些调查都得出了一致的结论：即，人们是为了自己开心而看电影，不是去欣赏影片的思想内容或艺术水平。一位影评家的对策既大胆又具有代表性，他说，“考虑到我们影片市场的消费结构，制片时，应首先考虑到娱乐性。”^⑫

文革前，党为中国的电影也制定了一条指导方针：反映当代大事的影片至少要占 60%；（即所谓的“政策影片”）；革命历史故事片应占 30%。健康的轻松生活片只能占 10% 或更少。然而 1986 年之后，“娱乐片”控制了整个市场（60—70%），使得“宣传片”和“艺术片”暗然无光。^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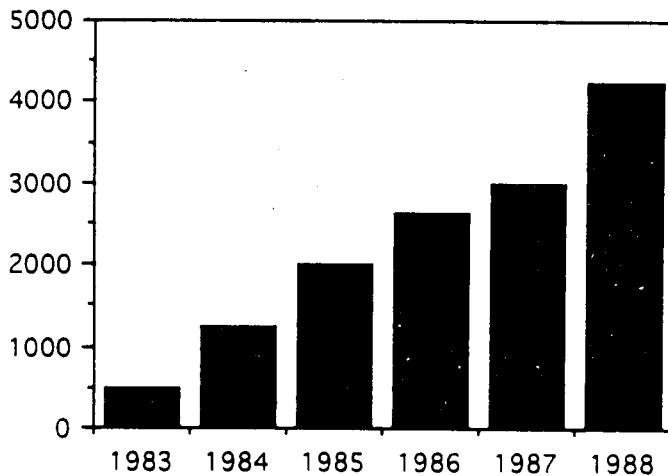
电视：

因为看电视已成了主要的娱乐活动，规定电视节目内容对政府来说就很重要了。鉴于这样一个事实：中国私人还未拥有电视台，也许有人认为，这并不是一个困难的任务。但是正像电影例子一样，真正的情形并不那么简单。虽然电视观众可以选择的节目数目很少，但他们有一个政府无法控制的选择——关掉电视机。^⑭

无数的研究早已经表明，观众看电视主要是为了消遣和乐趣，而不喜欢那种进行大量思想灌输的节目。人们喜欢的是电视剧，特别是那些从日本、香港、台湾和美国进口的节目。^⑮作为一种反应，电视剧的生产虽在 80 年代迅速增加（见图 4）。但到了 80 年代后期，进口的电视剧仍占有所播放的电视剧的三分之一。^⑯

图 4：

中国电视剧产量的变化
Number of TV Dramas Produced in China



资料来源：《中国广播电视台年鉴》1986 年至 1989 年。

电影和电视两个例子都说明了国家再也不能规定在屏幕上人们看什么或不看什么。相反，人们的爱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节目策划者的决定，用劳伯特·爱丽斯（Norbert Elias）的话，就是国家和电视观众构成了一个“互动关系”。^⑰观众除了看国家允许他们看的之外，无其他选择。但

这并不意味着国家可以控制互动关系中的每一个联结点。为了吸引群众，国家不得不经常思考制作什么，进口什么，在这个意义上，观众限制了国家的选择范围。这种相互依赖引起了结构性的紧张和冲突，而这些冲突决定着该互动关系的变动方向。

出版：

到目前为止，如果说国家还能保持住对电影和电视的独占，它对出版的控制则已受到了严重的挑战。

在过去十年，成千上万的印刷设备安装在乡镇企业，甚至是私营企业里。他们考虑的主要是“市场信号”，而不是政府的指导方针。更重要的是，由于利润或亏损成为考核的重要标准，某些出版者经不起利益诱惑，与一些胆大妄为的私商联手。结果“非法出版物”屡禁不止，反映出政府在这方面控制能力的下降。

自1980年以来，在几个明显的转折上，中国读者的爱好发生了变化。1980年是侦探小说，1981—1983年是古代侠客小说，1984、1985年是现代侠客小说，1986年是三角恋爱小说，1987年是色情小说。^②相应地，“非法出版物”的内容已从“打斗到谋杀”、从“色情到淫秽”到“封建迷信”^③。在80年代后期，面对来自上百家新创刊的通俗杂志的竞争，某些严肃的文学报刊也不得不被迫去迎合读者的口味：如超自然的神力格打、爱情、时尚、暴力、犯罪等等。^④

1987年，政府第一次发动取缔“非法出版物”时，目标是“地下出版者”。即未经登记注册的乡镇印刷厂。这些印刷厂未得到出版的许可。^⑤然而，“非法出版物”在1988年再次猖獗。那一年，有35个国有出版社因出版色情文学而受到警告。^⑥

1989年春，又出现了新的一波色情文学。这也是1989年动乱后，中国政府发起更有力的反对“非法出版物”运动之部分原因。这一年，310万册书籍、杂志被没收。106家庸俗杂志，190家报纸和41家出版社被查封。^⑦然而过了不久，“非法出版物”开始反扑。^⑧1990年冬天，政府发动了第四次反“非法出版物”运动。^⑨1991年，中国发动了一场新的声势浩大的取缔“非法出版物”运动。这是一连串运动中的第五次。^⑩一段时间里，它抑制了“非法出版物”。但政府不大可能获得全面胜利。只要那种对“非法出版物”的巨大需求仍在，总有人会为了牟取暴利而甘愿冒违反法律的危险。1992—1994年三年，笔者访问中国时发现“非法出版物”几乎在每一个书摊都有出售。

结 论

在中国经济改革的过程中，私人时间的合法性已得到恢复。加上社会时间观念的变化，私人空间实际上已大大增加。中国人开始享有一个比1949年以来的任何一个时期都广大的私域。

私域的扩展，既是因为社会力量的“一点一点”的努力，又同样是因为国家有意识的退却。国家愿意这样是因为它已懂得，不留给人们喘息时间和空间，他们会变得沮丧，压抑。为了调动广大人民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积极性，国家不能垄断个人的每一分钟，并且使其蒙上浓厚的政治色彩。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愿意用一种放任态度来对待人们用什么方式来利用私人时间。虽然国家的“不管地带”已变宽了，它仍希望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去影响人们的闲暇模式，以求把人们的过剩精力导向在它看来，是有利于生理的健康，道德的完善，社会的稳定，政治的团结的活动。然而市场取向的改革已破坏了国家充当指导角色的能力。在闲暇的政治色彩越来越减少时。商业化也加剧了。对于包括国家机构在内的大部分娱乐产品提供者而言，利润已取代了意识形态，成为关注的主要因素。为了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他们经常不顾官方的指导方针如何，对“市场信号”作出反应。这样，个人偏好经常能通过“灰色的”或“黑色的”文化市场得到满足。这些市场实际上拓展了人们的私人空间。

【注释】

- ①R. W. Vickerman, "The New Leisure Society: An Economic Analysis", *Futures*, Vol. 10, No. 3 (1980); p. 192.
- ②引自 P. Baily, *Leisures and Class in Victorian England*, London: Routleges & Kegan Paul, 1978, 180.
- ③Aristotle, *Politics*, 1337a 31.
- ④Karl Marx, *Selected Works*,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68, 219.
- ⑤E. P. Thompson, "Time—Work—Discipline and Industrial Capitalism", *Past and Present* 38, 1967: 56—97; and Douglas A. Reids, "The Decline of Saint Monday: 1766—1876," *Past and Present* 78, 1976: 76—101.
- ⑥W. Sutherland, "A Philosophy of Leisur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September 1957: 136.
- ⑦对资本主义国家作用的讨论见 John Clarke and Chas Critcher, *The Devil Makes Work: Leisure in Capitalist Britain*, London, MacMillan, 1985, 122—143.
- ⑧Chris Rojek, *Capitalist and Leisure Theory*, London: Tavistock Publications, 1985, pp. 180—181.
- ⑨James Scott, *The Weapons of the Weak*,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336.
- ⑩Stephen G. Jones, *Works At Play: A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Leisure 1918—1939*,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6, p. 165.
- ⑪Rojek, *Capitalism and Leisure Theory*, p. 156.
- ⑫Karl Marx,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of 1844* (London, Lawrence at Wishart, 1970), 737.
- ⑬刘子久：“一手抓生产，一手抓生活”，《冲天干劲和科学分析》，香港三联书店 1959 年版，页 22—24 页。
- ⑭梅械：“应当尊重别人的自由”，《中国青年》1956 年第 12 期，页 31。
- ⑮Charles Taylor, ed., *China Hands: The Globe and Mail in Peking* (Toronto: McClelland and Stewart Limited, 1984), p. 26.
- ⑯马齐彬、陈文斌等编：《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 1949—1989》，北京：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9 年版，页 185。
- ⑰见《中国青年》的社论，“劳逸结合是为了保证持续大跃进”，《中国青年》，1960 年第 12 期，页 30—31。
- ⑱马齐彬、陈文斌等编：《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页 185。
- ⑲Lowell Dittmer, "Public and Private Interests and the Participatory Ethic in China", Victor C. Falkenheim, ed., *Citizens and Groups in Contemporary China* (Ann Arbo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of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87), 17—66.
- ⑳甄德：“漫谈集体活动及其它”，《中国青年》，1956 年第 4 期，页 6—7。

- ㉑梅械：“应当尊重别人的自由”；郭林：“为什么一定要强求一致”，《中国青年》1956年第12期，页30—31；尚琪：“贯彻自愿原则，更加丰富多采地开展课外活动”，《中国青年》，1956年第17期，页8—9。
- ㉒《中国青年》，1960年第5期，页36—37。
- ㉓见《中国青年》1960年第6至第10期。
- ㉔马群：“看电影不能只是为了图轻松”，《中国青年》1960年第15期，页24；马秀云：“我们是怎样引导青年过好业余生活的”，《中国青年》1961年第4期，页24。
- ㉕白夜：“走出个人主义小天地”，《中国青年》1963年第24期，页10—11。
- ㉖《中国青年》，1964年第8—9期，页46—47。
- ㉗Susan Ford Wiltshire, *Public and Private in Virgil's Aeneid* (Amherst, MA: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89), p. 64.
- ㉘见Shaoguang Wang, *Failure of Charisma: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Wuhan*, ph. D. dissertation, Cornell University, 1990, pp. 490—491. 也见Perry Link "Hand-Copied Entertainment Fiction from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Perry Link, Richard Madsen, and Paul G. Pickowicz, eds., *Unofficial China: Popular Culture and Thought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Boulder: Westview, 1989), pp. 17—36.
- ㉙《中国广播年鉴，1989》，北京：中国广播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页336。
- ㉚国家统计局，《中国社会统计资料，1985》，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5年版，页307—308；《中国社会统计资料，1987》，页281—284；青连斌：“大城市职工生活时间分配和利用问题的初步研究”，1994年，工作时间才减为每周44小时。《社会学研究》，1990年第1期，页92—102。
- ㉛青连斌，上引文，页95—96、100—101；张建国：“改革促进了职工生活方式的变化”，《时代》1987年第1期，页7—10。
- ㉜由于没有全国性的时间分配统计，我对闲暇时间的估计是以几项地区性统计为基础作出的。这些统计相互间的可比性当然存在一些问题。但我相信表1有代表全国的一般趋势。例如在北京，每天的用饭时间在1982年至1986年间从3.5小时提高到了4小时。当然各地的情况不一样，各社会集团的情况也不一样。但这些统计却太笼统，使我们无法了解地区差别和社会集团之间的差别。
- ㉝《中国广播年鉴，1989》，页331—331。
- ㉞《中国广播年鉴，1988》，页401；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中国新闻年鉴1988》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页192。
- ㉟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0》，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0年，页294。
- ㉛《中国新闻年鉴1989》，页217。
- ㉜李元浦、阎晶昌：“天津市居民业余时间抽样调查”，《瞭望》，1986年第22期，页22；邓瞳瞳：“电视文化随想录”，《社会》，1990年第7期，页35。
- ㉝张鄭、蔡禾、江山河：“青年工人生活方式现状特点研究”，《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3期，页101—108；冒忍刚：“企业改革与职工闲暇生活方式的变化”，《社会调查与研究》，1985年第7期，页86—89。孙再庆：“对职工业余生活的三项调查”，《群众文化》，1986年第11期，页11—

12.

- ③9中国电影协会：《中国电影年鉴，1986》，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6年，页11—5，11—13。
- ④0《瞭望》，1991年2月18日，页41。
- ④1中新社，北京1992年2月2日电。
- ④2《中国广播电视台年鉴，1988》，页17—70。
- ④3《中国电影年鉴，1986》，页11—16。
- ④4《中国广播电视台年鉴，1989》，页344。
- ④5《中国广播电视台年鉴，1989》，页344。
- ④6中新社，广州1992年1月1日电。
- ④7卢汉龙：“来自个体的社会报告”，《社会学研究》，1990年第1期，页84。
- ④8卫云衡、刘玉迅、辛明华：“东北三省赌风透视”，《瞭望》，1991年第7—8期，页19—20；陈路：“赌博启示录”，《中国之春》，1991年第2期，页77—80；钟舒：“中国大陆少数个体户的生活百态”，《中国时报周刊》，1992年第3期，页71。
- ④9云兰：“放管结合，积极导向，推动文化市场健康蓬勃发展”，《群众文化》，1989年第10期，页9—11。
- ⑤0王海平：“南京青年的读书热”，《八小时以外》，1987年第3期，页11。
- ⑤1新华社，北京1991年12月29日电。
- ⑤2《世界日报》，1992年1月12日。
- ⑤3另外三种杂志是《红旗》、《半月谈》和《共产党员》，它们主要由单位而不是个人订阅。见《中国出版年鉴，1988》，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88年版，页120—121。
- ⑤4戴伴云：“风靡中国的钓鱼热”，《湖北青年》，1989年第8期，页20—23。
- ⑤5沈宇：“上海民间私人收藏的调查”，《社会》，1990年第8期，页16—19。
- ⑤6赵正达：“宠物热”，《社会》，1990年第7期，页20—22。
- ⑤7杨剑：“北京的围棋热”，《时代》，1988年第1期，页55。
- ⑤8Jones, *Workers at Play*, 200—201; and Rojek, *Capitalism and Leisure Theory*, 19—20.
- ⑤9《中国统计年鉴，1990》，页658。
- ⑥0Orville Schell, *Discos and Democracy*, 349—356.
- ⑥1同上，页355。
- ⑥2同上，页355。
- ⑥3石榴枝：“电视剧的渴望和困惑”，《中国之春》，1991年第5期，页65。
- ⑥4《中国广播电视台年鉴，1989》，页336。
- ⑥5《天津日报》，1988年7月20日；赵人伟：“我国转形期中收入分配的一些特殊现象”，《经济研究》，1992年第1期，页53—63。
- ⑥6与通常的理解相反，“第二职业”并不是什么新现象，80年代初，已有百分之五的国营企业职工有第二份职业。在改革过程中，担任一个以上职业的国营职工人数不断增长。到80年代末，大约百分之二十的国家职工有了第二职业。在深圳这个比重高达百分之三十五。见刘国兴，袁庆寿：“社会主义社会的职工业余劳动”，《北京论丛》，1981年第5期，页64—68；杨煜：“第二职业

- 透视”，《时代》，1988年第11期，页17—19；张邵：“深圳第二职业状况考察”，《社会学研究》，1989年第3期，页76—85。
- ⑥7易旭东：“都市夜生活”，《八小时以外》1990年第6期，页7—8。
- ⑥8Martin K. Whyte，“Urban China: A Civil Society in the Making?”, Arthur Lewis Rosenbaum, ed., *State and Society in China: The Consequences of Reform* (Boulder: Westview, 1992), 91.
- ⑥9余德虎：“有关我国社会团体问题的思考”，《求是》，1991年第17期，页15。
- ⑦0首钢工会：“办好职工文化活动中心，促进两个文明建设”，《群众文化》，1986年第6期，页15。
- ⑦1邵志雄：“兰州炼油厂职工业余兴趣活动开展活跃”，《群众文化》，1987年第11期，页28—29。
- ⑦2程路：“把青年的业余文化生活真正活跃起来”，《群众文化》，1986年第5期，页2—3。
- ⑦3黄瑞庚：“温州市群众文化活动的空前活跃”，《群众文化》，1987年第10期，页16。
- ⑦4《中国电影年鉴，1984》，页191。
- ⑦5《中国电影年鉴，1985》，页671—675。
- ⑦6王铁：“电视文化实现最佳社会效益的重要中介”，《中国电影年鉴，1986》，页11—16。
- ⑦7弘石：“消费，文化，电影”《群众文化》1988年第1期，页18—21。
- ⑦8一项全国调查发现四分之一的观众看到电视节目不如意的时候就会关掉电视机。见“中央电视台全国电视观众抽样调查分析报告”，《中国广播年鉴，1988》，页407。
- ⑦9《中国新闻年鉴，1987》，页138—187；《中国广播年鉴，1987》，页469、475；《中国广播年鉴，1988》，页400—413。
- ⑧0《中国广播年鉴，1986》，页883，《中国广播年鉴，1987》，页744；《中国广播年鉴，1989》，页518。
- ⑧1Norbert Elias, *The Civilizing Process: The History of Manner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78).
- ⑧2边春光：“从色情淫秽读物的出版所想到的”，《出版工作》，1988年第10期，页6。
- ⑧3《人民日报》1985年11月15日；《中国青年报》，1986年3月16日。
- ⑧4孙达人：“清除精神污染，全力整顿书刊影像市场”，《群众文化》，1989年第10期，页7。
- ⑧5《出版工作》，1987年第8期，页6—13。
- ⑧6蔡波、杨剑：“黄风掠过北京城”，《时代》，1988年第11期，页30—31。
- ⑧7编辑组：《中国百科年鉴，1990》，北京：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90年，页145—149。
- ⑧8尹进第：“消除黄毒，功在千秋”，《瞭望》，1990年第46期，页6—9。
- ⑧9中新社郑州1991年12月25日电。
- ⑨0美联社北京1991年12月19日电。

王绍光：美国耶鲁大学政治系助教授。